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明代卷

郭英德 张德建 著

大約太和山，一美文也。以通真至平台為壯
竹筒界，其經路最斜。以平台至紫霄為捷。通云
入洞，其移徑最古，以常霄至天門為趨。砂翠斑駁，
以明山為最，以天門至天柱為險，云奔霧歇，
以窮山勢，為最遠，故其驅干也。在平而得南崖，
雖明欲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老，公天陽日，
以幽道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對遠林，以寬中勝，
皆兼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涼台，依山傍洞，以
淹潤勝；又降而得蟠蛇洞，轉石奔雷，以清靜勝；
又降而得玉虛岩，凌虛嵌空，以蒼古勝，皆兼乎山
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左一右，
雜佩翕萃也。

AML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明代卷

郭英德 张德建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 明代卷 / 郭英德, 张德建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36-7191-4

I. ①中… II. ①郭…②张…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明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861 号

书名: 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

作者: 郭英德 张德建

出版人: 朱智润 策划统筹: 张丹飞 张利 责任编辑: 夏业梅
版式设计: 朱锦 装帧设计: 张鑫坤 技术编辑: 王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1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191-4 本卷定价: 128.00 元(全套定价: 149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明代论辨文 009

 第一节 元明之际论辨文 010

 第二节 明前期论辨文 019

 第三节 明中期论辨文 025

 第四节 明后期论辨文 038

第二章 明代奏议文 047

 第一节 元明之际奏议文 049

 第二节 明前期奏议文 052

 第三节 明中期奏议文 058

 第四节 明后期奏议文 064

第三章 明代书序文 069

 第一节 元明之际书序文 071

 第二节 明前期书序文 076

 第三节 明中期书序文 081

 第四节 明后期书序文 091

第四章 明代八股文 104

 第一节 明前期八股文 107

 第二节 明中期八股文 113

第三节	明后期八股文	119
第五章	明代书信文	128
第一节	元明之际书信文	130
第二节	明前期书信文	134
第三节	明中期书信文	139
第四节	明后期书信文	154
第六章	明代杂论文	170
第一节	元明之际杂论文	172
第二节	明前期杂论文	178
第三节	明中期杂论文	186
第四节	明后期杂论文	200
第五节	明代诗话与艺论	212
第七章	明代传状文	218
第一节	元明之际传状文	220
第二节	明前期传状文	227
第三节	明中期传状文	231
第四节	明后期传状文	242
第五节	明代自传文	251
第八章	明代碑志文	266
第一节	元明之际碑志文	268
第二节	明前期碑志文	273
第三节	明中期碑志文	280
第四节	明后期碑志文	290

第九章 明代杂记文	294
第一节 元明之际杂记文	296
第二节 明前期杂记文	302
第三节 明中期杂记文	310
第四节 明后期杂记文	325
第十章 明代游记文	332
第一节 元明之际游记文	334
第二节 明前期游记文	338
第三节 明中期游记文	342
第四节 明后期游记文	353
第十一章 明代赠序文	379
第一节 元明之际赠序文	383
第二节 明前期赠序文	388
第三节 明中期赠序文	394
第四节 明后期赠序文	402
第五节 明代寿序文	405
第十二章 明代哀祭文	409
第一节 元明之际哀祭文	411
第二节 明前期哀祭文	415
第三节 明中期哀祭文	418
第四节 明后期哀祭文	427
主要参考文献	435

绪 论

明代散文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元明之际、明前期、明中期与明后期。以下分述之。

(一)元明之际(元至正十九年至明建文四年,1359—1402),共44年。

元明之际的散文,既有山林之文,又有台阁之文,二者交相辉映,佳作迭出。这时期的散文承袭宋、金、元传统,创作的基调是恢复汉唐,崇儒复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明殷奎《强斋集》提要称:“元明之间,承先儒笃实之余风,乘开国浑朴之初运,宋末江湖积习,门户流波,湔除已尽,故发为文章,虽不以华美为工,而训词尔雅,亦颇有经籍之光。”

元明之际这种质朴醇雅的文风,一方面得之于元末儒学的濡染,一方面也得之于明初帝王的提倡。前者如《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文苑一》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尤其是在江浙一带,文人多有儒者醇雅气象,为文亦一遵故辙,总体上如贝琼《志古斋记》所云:“大抵立言不在于斩绝刻峭而平衍为可观,不在于荒唐险怪而丰腴为可乐。”(《清江文集》卷二十六)后者如宋濂《洪武圣政记》“新旧俗第七”记载,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等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故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扬雄、相如,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明太祖宝训》卷六“务实”、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二等亦记载,文字稍异)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之下,“通道

理、明世务”成为明初散文最基本的审美旨趣。

这一时期以江南文章为盛,承元末吴莱、柳贯、黄溍之余绪,前有宋濂、刘基、王祯,后有方孝孺,堪称一代制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宋濂《宋学士全集》提要云:“元末文章,以为一朝之后劲。濂初从莱学,既又学于贯与溍,其授受具有源流。……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募涧注坡;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则略有间矣。方孝孺受业于濂,努力继之,然较其品格,亦终如苏之与欧。盖基讲经世之略,所学不及濂之醇;方孝孺自命太高,意气太盛,所养不及濂之粹也。”同卷刘基《诚意伯文集》提要云:“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祯之亚。”同卷王祯《王忠文公集》提要云:“祯师黄溍,友宋濂,学有渊源,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宋人轨范。”同卷方孝孺《逊志斋集》提要云:“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四家之文风,大率如此。

此外,胡翰、苏伯衡、贝琼诸家,亦各出手笔,时有佳作。

(二)明前期(永乐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03—1487),共85年。

从永乐至天顺六十余年间,文坛上台阁体诗文独尊,代表人物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时号“三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杨少师士奇》)。三杨先后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官皆至大学士,权重位尊,“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七)。三杨主持天下文柄,倡导古文辞的写作,台阁体散文盛行于世。

台阁体散文的基本特征,大抵如解缙《廖自勤文集序》所说:“多养气以直,故充塞两间,而奔放浑灏;知言有要,故明辨切实,而引喻曲当。不矜谈天雕龙之巧,绝无怪奇隐僻之说。即其事之体而措之用,语其理之常而尽其变。未尝或昧于仁义道德,外经史而别为之辞也。”(《文毅集》卷七)台阁重臣大都讲求养气,以仁义道德为要旨,多为用世之文,故明辨切实,不矜巧饰之词,不为奇怪之说。台阁重臣主张“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正如黄淮《少

师东里杨公文集序》所说的：“肆其余力，旁及应世之文，率皆关乎世教。吐辞赋咏，冲淡和平，泐泐乎大雅之章。”（《东里文集》卷首）这种散文创作趋向的形成与对北宋欧阳修、曾巩散文的推重密切相关，故一时文章多以欧阳修所谓“雍容醇厚气象”为准的（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一《滁州重建醉翁亭记》），平正纾徐，淡泊简易。在此基础上，台阁体散文形成了冲淡平和、雍容大雅的文风。《四库全书总目》评道：“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骋之才，足以振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枯槁者异也。”（卷一百七十杨荣《杨文敏集》提要）

三杨“柄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摹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杨荣《杨文敏集》提要）。台阁体散文的羽翼者，有胡俨、金幼孜、黄淮、胡广、李时勉、王英、王直、倪谦等。

到了成化年间，文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李东阳“雍容台阁，执化权，操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昭代之人文，为之再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守仁传后评语）。李东阳力图扭转台阁体末流的弊端，着力复兴典雅正大、雍容和平的文风，提高儒雅文学的品位，他倡导：“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怀麓堂集》卷二十九《倪文僖公集序》）另一方面，成化年间也出现“为文以典雅为肤浅，怪异为古健”（《明史》卷一百八十《张宁传》）的趋向。如徐有贞的论辨文，“奇气坌涌，而学问复足以济其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武功集》提要）；罗玘虽为李东阳门生，但为人“尤尚节义”，为文“务为奇奥”（《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本传）。

（三）明中期（弘治元年至隆庆六年，1488—1572），共85年。

《四库全书总目》论明永乐以降的文章云：“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僞，虚僞之极，不得不变而务实。”（卷一百七十李东阳《怀麓堂集》提要）这一评价在总体上是准确的。

邹观光《答邹尔瞻》曾评道：“本朝至弘、正而后有三大文章：以理学为文章则王文成，破洪荒而超块垒；以气节为文章则李献吉，凜秋霜而劲烈

日,而何仲默为之翼;以文章为文章则王司寇,而毗陵为之翼……”(黄宗羲《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在明中期,王守仁以理学家身份而为文章,别立一格。而对转移文风为功最巨的,则是李梦阳、康海等弘德七子和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作家。

弘治七年(1494),李梦阳中进士。其后十来年间,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康海、何景明、徐祯卿等先后中进士^①。大约在弘治十五年(1502)前后,这些新进进士在京城相聚讲论,不满于台阁体貌似浑雅正大而实则萎弱庸沓的文风,“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李梦阳传》)。康海称:“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柘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剗,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魏晋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康海《对山集》卷三《渼陂先生集序》)

弘德七子在散文创作方面突破了台阁体的樊篱,何良俊指出:“国初之文,无不失于鄙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之。二公天才既高,加以发西北雄峻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李梦阳之文,“尚多己意,纪事述情,往往逼真”(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十《论文上》),成就高于其诗。而康海的散文,“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对山集》提要),更为世人称道。胡纘宗说:“国朝文袭宋,方孝孺其杰然者。自康德涵出,而人人拟司马子长矣。”(《愿学编》卷下)张治道《翰林修撰对山康先生状》也说:“是时孝宗皇帝拔奇抡才,右文兴治,厌一时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见先生策,谓辅臣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传颂则效,文体为之一变,朝野景慕,若麟凤龟龙,间世而一睹焉。”(《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三)

① 据《明史》列传,弘治九年(1496),王九思、边贡中进士;十年(1497),王廷相中进士;十五年(1502),康海、何景明中进士;十八年(1505),徐祯卿中进士。

与复古派大致同时,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吴中派作家崛起,缘情尚趣,追求自适与狂放,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文学风貌,以更为鲜明的非正统文化色彩,开启了明后期师心尚俗文学的新潮。此外,杨慎在文坛上也别张壁垒,独树一帜。

嘉靖五年(1526),王慎中进士及第;嘉靖八年(1529),李开先、唐顺之等人中进士。他们互相标榜,追随复古派,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陈束传》)。到嘉靖十四年(1535),王慎中召为南京(今属江苏)户部主事,迁礼部员外郎,由“文必秦汉”转向崇尚唐宋,并与唐顺之、李开先等人相互鼓吹,掀起唐宋派古文创作的新潮。唐宋派作家由学欧、曾而上溯至学马、班,王慎中《寄道原弟书十六》云:“方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学欧、曾哉?”(《遵岩集》卷二十)他们既肯定秦汉文章,更推崇唐宋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既主张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又力求神似,“法出乎自然”(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十《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因此,他们的创作在拟古中显示出鲜明的新变趋向。

其后,归有光以其创作实绩,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张大了唐宋派古文的声势。归有光的散文“风韵疏淡”(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人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五十《归太仆赞有序》)。黄宗羲甚至称归有光“为明文第一”(《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

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二年(1553)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在北京结为七子社,再度宣扬文学复古,时称“后七子”。他们“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吴峻伯先生集序》),“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李攀龙传》),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十六《送王元美序》)。后七子挟弘德七子之余威,风头强劲,在文坛上形成了其势汹涌的复古思潮,其末流沦为“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

笺校》卷十八《叙姜陆二公同适稿》)。

在后七子声势正大之际,徐渭提出“师心横纵,不傍门户”的主张(《徐渭集·徐文长逸稿》卷十六《书田生诗文后》),李贽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理论(《焚书》卷三《童心说》)。他们的散文创作独立于复古思潮之外,袁中道评李贽:“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袁中道著,钱伯诚点校《珂雪斋集》卷十七《李温陵传》)

(四)明后期(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共72年。

从万历年间开始,散文创作表现出背离复古拟古文风的趋向。如七子派的后劲屠隆,论诗文提倡陶写“性情”(《鸿苞》卷十九《诗文》)。七子派外的汤显祖,更是批评拟古文风,认为汉、唐以后,“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答王澹生》)。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等人形成“公安派”。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提出:“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提出:“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冯琢庵师又》)公安派倡导“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蟄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公安派作家的散文作品,以眼前之景、身边之事来抒写性灵,张扬个性,风格清新秀丽,生气勃勃。尤其是他们的小品文,在文体创新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清初王夫之慨叹道:“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稍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1592)之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薑斋诗话》)

到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间,钟惺与谭元春合作,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36卷,随后又评选唐以前诗为《古诗归》15卷。他们对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加以补救,提倡“求古人真诗”,抒写“幽情单绪”(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六《诗归序》)。以钟、谭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世称“竟陵派”。钟、谭主

张文学表现“幽情单绪”、“孤怀、孤诣”，并追求“幽深孤峭”的艺术境界，又面对着公安派“近平近俚近俳”的弊端，故其散文追求独造，虽不免有艰涩雕琢之弊，但貌似艰涩而实则奇崛，在晚明散文中独具一格。

稍后，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诸文社，主张为文应由唐宋入秦汉，继承了唐宋派的观点。以张溥、张采等为代表的复社文人，“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之学”（陆士仪《复社纪略·复社宗旨》）。他们以通经学古为宗，重视人品学问的修养，在文学创作上大致承袭七子派的主张。陈子龙等几社文人更以古文辞为尚，主张“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十二《壬申文选凡例》）。但他们注重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尤其强调以“忧时托志”为“诗之本”（《陈忠裕公全集》卷七《六子诗序》）。陈子龙有见于“士无实学”（《陈忠裕公全集》卷八《经世文编序》），与好友一起辑录《皇明经世文编》，“志在征实”（宋徵璧《经世文编凡例》，《明经世文编》卷首），便体现出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趋向。

而张岱少学徐渭和袁宏道，后来又学竟陵派，最后认识到：“用学问者多失之板实，用俚语者多失之轻佻”（《张岱诗文集·琅嬛文集》卷一《桂铭抄自序》），于是“自出手眼”（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又与毅儒八弟》），独树一帜。在明季，张岱和王思任、刘侗等作家，承公安派“性灵”之说，又融合陈子龙“忧时托志”的文学思想，创作了一批空灵之美与充实之美相结合的小品文。这种“以坚实为空灵”的创作追求（张岱《琅嬛文集》卷五《跋可上人大米画》），一直延贯到张岱入清后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小品文写作。徐弘祖的《游记》更以科学与艺术的兼容，成为“千古奇书”（钱谦益《嘱毛子晋刻游记书》，徐弘祖著，褚昭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卷十下附录）。

此外，张煌言的文章多作于抗清期间，大都慷慨悲壮之辞，全祖望评其文曰：“尚书之集，河岳所钟，三百年元气所萃也。……呜呼，古来亡国之大夫，其言必凄楚郁结，以肖其身之所涉历，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张苍水集序》）

就文体分类而言，明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大致可归为三大类型，即议论

文、叙事文和抒情文。王世贞说：“持论之文辨而不激，叙事之文峭而能洁，发意之文畅而归典。”（《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这大抵概括了明代三大类型散文的基本特征。在议论文、叙事文、抒情文三大类型中，本卷依次选择论辨文、奏议文、书序文、八股文、书信文、杂论文、传状文、碑志文、杂记文、游记文、赠序文、哀祭文等文体，分章加以考察，描述在上述四个时期中一些代表作家的散文创作特色，以展现明代各种文体的历史演进轨迹。

第一章 明代论辨文

论辨文,包括论(含史论、设论)、说、辨(辩)、原、解、释、驳、考、评、问、对等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认为:“述经叙理曰论”,论其大体,则有四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序引共纪”。所谓陈政、释经、辨史、铨文,也可以大致概括明代论辨文的内容。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论分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言,八曰设论”,则兼内容与笔法而论之。大体而言,明代论辨文,尤其是明中期以后的论辨文,精神所注,更集中于经世致用之事。

从总体上看,明代论辨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主体性、思辨性和感染性。明代论辨文在内容指向上,强调自创新意,翻新出奇,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解,表现出主体性特征;在论证方式上,偏重执一而论,明辨是非,发挥势如破竹的气势,表现出思辨性特征;在表达方法上,喜好引古证今,“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贍为上”(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表现出感染性特征。在这三方面时代特征中,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最能体现明代论辨文作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崇尚和张扬。明代论辨文作家往往极力在畅所欲言的议论之中,表达自身独特的思想,从而使论辨文发挥独特的文化功能,这也赋予明代论辨文以深刻的思想价值和丰厚的文化价值。

第一节 元明之际论辨文

元明之际论辨文的代表作家,有宋濂、胡翰、贝琼、苏伯衡、方孝孺等。

宋濂(1310—1381)是元明之际的一代文宗。《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称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宋濂的论辨文,大多以道德为基,以六经为本,以圣贤之说为据,所以侃侃而论,多为堂堂正正之词。清邵长蘅评道:“余尝谓明代名能文章亡虑数十家,文之工者不乏,正苦根柢浅薄,求其贯穿四库之书而粹然一本于《六经》,不得不推潜溪。”(《邵青门全集·青门麓稿》卷十一《书宋学士集后》)

如《文说赠王生黼》,开篇即提出“文”不是一般文学之“文”,而是“圣贤之道”:

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着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犹水与木然。导川者不忧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忧其枝之不蕃,而虑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御?圣贤未尝学为文也,沛然而发之,卒然而书之,而天下之学为文者莫能过焉,以其为本昌,为源博也。(《宋学士文集》卷六十六)

因此,欲求为文,必须“参之于气而致其平,推之为道而验其恒,蓄之为德而俟其成”,这才是培本深源之法,而不必“攻乎虚辞,以自附乎古”。这是因为文者“发乎心也”,心者“主乎身也”,圣贤“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而今之人“不浚其源而扬其澜,不培其本而抽其枝”,为文只能枯槁。宋濂以“圣贤之文”作为立论根据,首先论证圣贤之文的来源,反证以今之人的舍本求末;继而说明文发乎心而主乎身,立身是为文的根本;最后说明欲知圣贤之为人,必读圣贤之遗书。全文主旨鲜明,层层递进,颇富说服力。

又如《六经论》,本乎理学正宗,论述“六经皆心学”的道理,颇有雄辩之气。文章起首说: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说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极也;说事莫辨乎《书》,由吾心政之府也;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说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恶也;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叙也;导民莫过乎《乐》,由吾心备人和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其道不亦较然矣乎? (《宋濂全集》卷二十八)

因此,圣人之所以要传六经之学,“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而后学之士,或沉迷传注,不知治心之理,或“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这实在是违背圣人传经之本意。全文慨乎其言,抑扬顿挫。

胡翰(1307—1381)的论辨文,一般议论平正,文风朴实,晓畅可读。《四库全书总目》云:“史又称翰少从吴师道及吴莱学为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今观其文章,多得二吴遗法,而持论多切世用,与谦之坐谈诚敬小殊。然尝与修《元史·五行志》,序论即其所撰,今见集中,于天人和同之际,剖析颇微。《牺尊辨》、《宗法论》诸篇,亦湛深经术,则又未尝不精究儒理也。”(卷一百六十九《胡仲子集》提要)“湛深经术”、“精究儒理”,同样表现出元明之际文章家的主流风貌。